



# 「圖書館與國家競爭力——2010論壇」 舉辦緣由

顧 敏 國家圖書館館長

本人自接掌國家圖書館以來，便汲汲以「提升圖書館社會價值、培養高素質圖書館員、實施知識支援型工程，以及邁向世界知識基地」為職志，近年來積極為國家圖書館與台灣的圖書館事業謀求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其具體作法包括制訂國家圖書館《2010至2013中程發展策略計畫》，推出國圖服務年系列活動，推廣「漢學書房」，將國圖的服務延伸至各大學校園及機關團體。同時，還積極與國內的大專校院合作，以「論文公開·知識傳播」為宗旨，辦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加強學術發展及傳播。

這次召開「圖書館與國家競爭力——2010論壇」之目的極為多元且有其必要性，除了要探討未來10年我國圖書館發展方向，以及建構第4次全國圖書館會議之中心議題外，最為切要就是凝聚社會中各領域人士對於圖書館資訊服務之具體需求，確認圖書館之適切功能與角色，並針對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議題，提出前瞻可行的做法和建議。

「第4次全國圖書館會議」預訂於今年底召開。本館先前在今年5月5日舉辦「圖書館事業發展——2010青年論壇」，獲得青年學子們熱情的迴響，吸納了不少發自年輕世代朋友們對圖書館未來的期待與理想。而「圖書館與國家競爭力——2010論壇」共計舉辦7場，這不僅是先前「青年論壇」的續航發展，更期盼能從全方位的角度探討圖書館事業未來發展的諸多面向，以期增進爾後「全國圖書館會議」之效益。

本系列論壇以「社會發展」為開端，因為圖書館是社會的重要資源，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指標，意義非比尋常。本館做為台灣圖書館界的前驅單位，肩負社會教育之使命，更應為圖書館如何協助導正社會風氣與增進國人閱讀興趣，進一步貢獻圖書館業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能。

「圖書館與科技發展」則是第二棒，談的主要是科技與圖書館之間的關連，過去10餘年來，作為知識傳播平台的圖書館，因拜數位科技之興，讓學術研究與知識傳播可以更加便利，知識能徹底獲得解放，擴及到普羅大眾。但資訊科技的發皇背後也隱藏著刀刃之險，例如Google的勃興，尤其是號稱可以消除知識障壁的Google Books問世之後，不僅對圖書館的地位造成莫大的衝擊，就連出版業者也都叫苦連連。原本科技是圖書館邁向現代化成為資訊社會心臟的滋養活泉，兩者是供需的關係，但發展至今，圖書館卻也因為科技一勞永逸的便利性而面臨存亡攸關的窘境！這種矛盾情結，該如何化解？如何善用科技之力，幫助圖書館突圍重生，並發揮其功能，反過來益助台灣科技界開創新機，再現榮景？科技界與圖書館界該如何創造雙贏，兩者互利，的確是個複雜難解的議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探究。

第三棒為「圖書館與經濟發展」，談到經濟發展與圖書館之間有何關連，很多人或許直覺認為圖書館與經濟間應該是涇渭分明，兩者很難產生糾葛。但在全世界兩次大規模的經濟不景氣年代，西元1873年以及1929至1931年，雖然百業蕭條，景氣低迷，但圖書館員卻意外發現，進入圖書館的民眾人數暴增，借書



率也節節攀升。1933年時，美國圖書館協會估計，自1929年以來新增的借書人次大約在200萬到300萬之間，而圖書流通量增長了5成。美國圖書館雜誌的一篇文章〈經濟蕭條與重訪公共圖書館〉中指出：「當經濟下滑時，圖書館利用率便上升」、「在經濟情況不佳時，圖書館利用率往上升」。事實上，William Poole在芝加哥公共圖書館1880年的年報中就已提出相同說法，美國另一位圖書館學者Stephen B. James則於西元1986年再一次撰文指出「每當國家面臨經濟困窘時，公共圖書館便很興旺」，該說法之後被稱為「圖書館員定律」(the Librarians' Axiom)。西元2001年3月美國又面臨經濟蕭條，美國圖書館協會於西元2002年決定再作一次研究，經過分析18所公共圖書館的流通(circulation)數據後發現，西元2001年3月後的流通量明顯增加。

國內竟然也發生類似狀況，台灣從民國97年8月遭受全球金融風暴的襲擊，各種產業幾乎無一倖免，唯圖書館的使用率逆勢成長。以台北市市圖為例，民國97年每個月的使用人次較96年增加了7萬之多，連非寒、暑假使用人次都破百萬；民眾在圖書館的借閱冊數，一個月就增加2成。不僅北部如此，中部及南部也雷同，台中市文化局統計，民國96年全市一年的借書量增加1成3，高雄市立圖書館民國97年則是增加了13萬本圖書借閱量。這些數據說明了因為經濟景氣差，所以民眾以借書取代買書，圖書館的利用率因而攀升。依此看來，經濟發展與圖書館的興衰之間確實存有微妙的連結。

第四棒為「圖書館與政治發展」，說起圖書館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時下一般人會認為圖書館是文教機關，與政治之間距離遙遠，無甚關連。但嚴格說來，中國在古封建時代，圖書館其實是執政者的書房、藏書樓，掌管圖書館的官吏就是君王的諮詢顧問。隨著時代進步，圖書館的角色跟著轉變，由藏書樓隱密的角色逐漸面向大眾公開，最終成為當今大家所熟知的「提升全民知識素養的終身學習中心」。最近幾年，談到圖書館與政治之間的連結點，許多人都會不約而同想到「智庫」這個詞彙。「智庫」一詞導源於1960年杜魯門總統在80歲生日的講話中即興說了Think tank，之後1967年6月《紐約時報》在介紹蘭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文章中，首次使用「Think tank」一詞來形容這家專長於軍事國防安全研究的民間智庫。

智庫這個名詞，就中文的理解便是「智囊團」，唐朝便有「智囊」一詞的註解——顏師古說：「言其一身所有皆智算，若囊之盛物也」，英文的Brain power便是此意，後來1932年出現Brain trust(智囊團)，用以專指羅斯福總統身邊的顧問們，直到二次大戰後，智囊團的組織獲得進一步的制度化、規範化及社會化，並且獨立化發展，智庫公司於焉成形，甚至蔚然成風。

智庫的功能是專門為政府或企業高級管理階層提供各種具體有效的資訊、建議、指導、策略，也是生產理念、供給人才、謀求共識、教育公眾，甚至是充當政府外交的第二渠道的機構。圖書館作為資訊服務機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圖書館本身擁有豐富多樣的書刊、報紙甚至是資料庫，在知識經濟掛帥的今天，擁有知識就能創造經濟效益，因此圖書館就像知識創新的製造工廠，能從裡面源源不絕生產新的知識與智慧。而「智庫」所產出的決策必須建立在大量的資訊文獻基礎上，圖書館在蒐集、管理、分類及提供文獻資訊方面具有絕對的優勢和得天獨厚的條件，因此圖書館能充分利用豐富的文獻資訊，結合各方面需求，為政府各部門甚至企業單位的發展計畫提供可行方案，做為決策參考，形同「智庫」。



第五棒為「圖書館與學術發展」，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裡，圖書館與學術一直保持著亦步亦趨的關係，但檢視過去政府對於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舉措多偏向於科技產業或科技研發，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術研究並不受政府的青睞。台灣面臨知識創新世紀的諸多挑戰，學術發展受到重視的同時，圖書館卻沒有連帶受惠，甚至學術發展與圖書館各自分歧，學術發展與圖書館的發展產生裂變，實不利於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揆諸歐美先進國家，學術傳統深厚與並重視知識力量，在增進學術發展的同時，更不忘隨時強化圖書館的資源與設備，因為圖書館是人類知識成果的匯整寶藏。圖書館長期來既是學術的公器，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政府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餘，圖書館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幫助呢？尤其資訊正以急猛的速度產生與變異，學術發展當然也要跟上腳步，所以圖書館的角色更形重要，但究竟該如何整裝齊備？是繼續隱身在學術發展的背後，苦守堅忍；還是轉型出發，發揮超越「學術發展資源中心」的功能？

最後一棒是「圖書館與教育發展」，將分別在國圖和高雄市立文學館舉行，以收集更廣大的輿情，加強我們對圖書館工作的認識。跨入 21 世紀，台灣經濟想要重振旗鼓、再造奇蹟，就必須運用「知識經濟」的力量，巧用知識創新，掌握先機為教育轉型助力。圖書館長期以來，便是知識儲藏、知識管理與知識傳播的集散樞紐，過去 10 餘年來藉助網際網路迅急而猛烈的傳播速度，圖書館已成為資訊社會中製造知識產能的重要基地之一，如何發揮圖書館所具備的知識管理長才，妥適導入教育發展體系，以引領台灣的教育發展，則是目前圖書館發展責無旁貸的當急之務。

根據 IFLA 的統計，全球有 50 萬所圖書館，隨著全球化加劇，知識等同競爭力，原來扮演知識供應者的圖書館，面對以網際網路主導的社會環境，未來的圖書館事業又將如何定位及發展？如何引起讀者的重視？圖書館員如何成功轉型等問題，再再影響圖書館之功能定位。為此，我們實有必要全面省視圖書館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增進圖書館的服務效能。

猶有進者，UNESCO 在 2009 年提出了國家資訊社群政策 (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Policies, NISPs)，旨在為「為全人類打造資訊社會」而進行國際合作的伙伴們，提出一個工作框架。該政策由 UNESCO 的全人類訊息計畫小組 (Information For All Programme, IFAP) 提出，其中心思想在確保全人類都能獲得能改善他們生活的資訊，政策的實行面也著眼於政府該如何與企業、社群組織、科學和技術部門合作。IFAP 只是為全世界提出一個政策框架，至於該如何落實，則有待各國政府努力，依據各國的風土民情、文化習慣來打造各國的政策。

NISPs 的制訂正式揭開了資訊社群將成為主流的時代來臨，圖書館處在這個的轉捩點，必須緊緊把握住已有的「資訊寶庫」優勢，才能乘著資訊社群發展的狂潮，直抵鞏固國家競爭力的彼岸，為國家未來的黃金 10 年打好基礎。這是本人對圖書館從業人員的深切期望，也是圖書館能為社會做出的最大貢獻。